

第一部分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

1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

在大学里，人们经常听到“学术自由”这个词，好像它是很神圣和庄重的字眼。尽管只是从 20 世纪初期人们才开始使用这个词，但它又似乎始终与我们同在。和它的重要性一样容易被理解的是，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正是学术界——而不是美国生活的其他领域——维护这样的权利，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

在 20 世纪，已经证明这种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在 50 年代初期出现反共情绪期间，为了解除那些被认为是“非美国的”组织（即同情共产主义目标的组织）成员的大学教师的职务，国会的各委员会，特别是在威廉·詹纳（William Jenner）任主席的众议院和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任主席的参议院，给大学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校长们和大学管理委员会勇敢地面对这种压力，同时，学术自由的传统也给大学增添了抵制这种压力的力量。因此，对于学术界的人而言，这一传统维护了学术实验的宝贵空间，即为学术实验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

事实上，这种自由进一步地延伸，就是允许具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人享有非同寻常创造性的生活。的确，学术自由意味着松散的结构和最低程度的干涉。在学术努力的方向上，或者甚至是在所要进行学术活动的场所中，不仅没有时间的限制，而且只有

很少的关于努力方向或学术工作场所的规定。学术工作和其他行业的工作是如此不同，以致于我们发展出一对非正式的词汇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差异，即称学术领域为象牙塔，而称其他一切别的领域为真实的世界。

与学术自由互为补充和对应的是学术责任，但后者却鲜为人用。在我们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这二者被视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谈到个人自由与群体责任之间的对称与均衡关系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表述地很好：“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它们是交易的关系”。

这的确是交易。但是，在我们如此自由地谈到学术自由时，为什么学术责任听起来是那么不合乎惯用的说法呢？这种差异集中于一个重要的悖论。一方面，目前美国的高等教育非常强大和成功。与此前相比，它为更多的人服务，而且比任何时候服务得更好。它建立了一套国际标准，把世界各地的学生吸引到这里来。它支撑着世界上最强大的、以大学为基地的研究系统。而且，它被许多人认为是対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革新孵卵器。然而，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却也变得越来越尖锐和刺耳。这些攻击来自各个方面，既有左翼势力，也有右翼势力。攻击的内容涉及各种不同的主题：科学和政策研究不能提供给我们非常需要的答案（艾滋病为什么不是一个过去的事情？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为什么状况不佳？）；大学生指导质量欠佳（为什么 Susie 的微积分老师不能说和 Susie 一样好的英语？）不能适当回应经济上的银根短缺状况（各地的公司都在缩小规模；高等教育的生产率为什么没有改进？）。学术界已经觉察到这些攻击，其士气也已降低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有证据表明，在社会对大学的期许和大学看待它自身的方式之间存在着不和谐。因为，尽管人们理解了自由对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必要性，并且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它，但是，与之对应和平

衡的义务却模糊不清。坦率而言，在由谁负责的认识上存在着混乱：是由大学对社会负责和教师对学生负责？还是由行政管理者对社会和学生负责？学术自由是一个被广泛认同的价值观；而同等重要的学术责任却难以理解。

事实上，学术责任是象牙塔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难解之事。人们很少对新的教师成员提及责任，在学术文献中也很少能找到关于教师责任的内容。也许这是学术自由传统的一部分，在高等教育中没有关于本行工作的描述，没有一年一度的业绩评估。但是，其结果之一是，不仅学术圈中的人们对教授职位的期望是模糊的，而且公众对此的认识尤为如此。

因此，学术界以外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标准可以用来评估大学教师，这自然引起人们的怀疑。教师拥有太多的自由，然而却缺乏规范。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责任（accountability）一词正在和高等教育逐渐地联系起来，即公众想要更多地了解大学的运作情况，因为他们并不满意那些关于大学产品质量的宽慰人心的保证。

尽管人们对于大学的怀疑已经公开化，但是，目前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美国人在接受大学教育。而且，大学、学院及其教师，甚至是他们的领导者继续拥有与其他的机构和行业相比更为牢固的地位。更多的人正在支付更多的费用供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或者说，日渐增多地为他们自己接受教育付出费用！）。以一生的增值收入来衡量，高等教育的价值在 80 年代急剧增长，以致在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创下了历史上的最大差距。

今天的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完成新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重任的挑战。过去，高等教育一直被期望能够赋予年轻人更多的技能、更多的教养和更多的思想，而现在它却被看做是地区经济改善、甚至是国际竞争的推动力。它被期望能够研究从更好的健康保健

到军事备战等所有基本的问题。而且，如果它没有给我们提供我们文化的启迪，即使是周末的运动娱乐，我们也会感到失望。

简而言之，高等教育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依赖它，也相信它。当它令我们失望，我们就变得失望；而当它开销太大，我们就会愤怒。这种超乎寻常、至关重要的机构是什么？它是怎样逐渐成为今天这种状况的？

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充满了悖论。对一些人而言，“大学”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正是在那里一个人成长、学习、生活、恋爱，或许还是第一次思考伟大的思想。对另一些人而言，它是产生赚钱热望的地方，在那里一个人第一次面临为一项职业做准备的艰巨任务。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它是国民智性生活的中心，一个我们的文化萌发出新的幼芽的地方。当然，在我们许多人当中，这些不同的描绘被融合在一起，而且增加了更为细致的成分。因此，关于高等教育机构是什么的概念取决于我们个人的经历，也取决于关于社会应该如何运转和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什么更为超然的构想。

我们对高等教育有太多不同的想法，因为高等教育机构本身是多样的。在这个国家有 3000 多所 4 年制高等教育机构。它们授予各种各样的学位：法律和医学的专业博士学位、普通的哲学博士等高等学术学位和少见的音乐艺术博士，以及从艺术史到动物学等各个方面的学士学位。小型的、只有几百名学生的实验学院与拥有超过 5 万个学生的巨型州立高等教育机构并存。还有福音派的大学、天主教大学，以及进取的非教派性大学。一些是“赠地”大学——在 1862 年根据莫里尔（Morrill）法案建立的州立大学，这类大学除担任其他工作，主要负责农业研究和发展；一些是由市政支持的城市大学。一些大学是纯粹的技术学校，另一些大学仅专注于艺术与文学领域，还有一些院校十分综合，以致于无所不包。一些大学由于地域和传统的缘故而服务于少量的

少数民族学生；另外一些学校，象历史上的黑人大学（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明确地倾向于为黑人学生服务。

要建立和运作一所大学并没有执照的要求。但是，如果要受到认真的对待，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必须通过鉴定。通过鉴定意味着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正在依据一个由自愿鉴定协会建立的标准规则进行运作。遵守标准规则的情况，通过由来自其它机构学者组成的委员会的定期访问来进行。

完全通过鉴定的机构组成一个联合体（consortia），以便谋求共同的目的，这些协会的名称可以显示出它们不同寻常的特性。它们当中多数可以在华盛顿地区杜邦圈子的一座大楼里找到，这是一个便于议会或政府人物偶尔访问的地方，他们当中有些人需要了解关于美国大学问题的建议。这类团体中，最著名的是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AU），这是一个由大约六十所研究性大学组成的团体，它的成员学校授予全美国将近 3/4 的专业博士学位。其中有哈佛、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的私立大学，也有密西根、加利福尼亚和伊力诺伊等优秀的州立大学。像美国高等教育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Higher Education）一样，美国教育学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是另一个更大的包括各种机构的网络组织。全国州立大学和赠地大学协会（NASULGC），既包括了属于美国大学协会中的赠地大学，也包括了不属于美国大学协会的一些州立大学，例如俄勒冈州立大学和堪萨斯州立大学。州立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吸收了那些一般不授予博士学位的综合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它的成员，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系统和俄亥俄州的博林格林大学和肯特州立大学。全国独立大学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服务于私立大学，既包括美国大学协会成员，也包括非常小型的文理学院。此外，社区大学也设有自己的协会。

如果考虑到高等学校的庞大数量和复杂构成，那么对于公众对高等教育产生如此多的不同看法就感到不足为奇了。对于公众而言，很难用一套简单而统一的价值标准把加州理工、蒙大拿州立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和圣玛利亚山大学联系起来。美国人总是对高等教育有着矛盾的看法，这也有助于解释下列对变化着的认识，即一方面高等教育被看做是一条社会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显示出精英意识的思想，即“目中无人”。在关于高等教育的奇谈中，弗兰克·梅里威尔（Frank Merriwell）和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达成某种共识。然而，对于过度的学习有种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式的怀疑。这种怀疑初期是反映在卡通形象中粗心大意的教授身上和傲慢自大、不肯与普通人谈话的大学生身上。这种怀疑也成了当代民俗的一部分，例如，针对进入主要球队俱乐部联合会的大学篮球队员，凯西·斯坦格尔（Casey Stengel）指出，“说他受过教育，结果他不能出击。因此，你不能让他在那呆得太久。”即使是我们当中那些醉心于环境生物学的人也能从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的著名格言“研究自然，而不是书本”中看出这种怀疑态度的暗示。

在我们国家的传统中，高等教育既是令人羡慕的，又是令人怀疑的，这可以帮助解释这样的当代悖论，即高等教育一方面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成功，与此同时，它也经常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与审查。成效很容易被总结。美国的大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来从事研究生学习和专业学习；美国的父母正以惊人的为他们子女的大学入学竞赛做准备，这使得一种以咨询和辅导服务为目的的庭院工业发展起来。但是批评也是复杂而多方面的，如果我们要理解这种学术责任的明显失败，就需要彻底地考察批评的性质与苛刻程度。

学费太高了；种族的紧张关系导致隔离；教师对本科生重视

不够；大学管理过于松弛，对待性骚扰过于温和，不能处理研究行为不检的蔓延；运动员丑闻和校园酗酒的失控；政治上正确成为一种时尚。而且，这仅仅是很短的列举。

在 70 年代末期，美国的卫生保健体系被一个观察者描绘为“做得较好，但是感觉较差”。对于美国今天的高等教育同样如此。例如，在 80 年代期间，传媒对大学校园种族事件的报导过于普遍和夸张，这使得许多没有直接经历的美国人以为，非洲裔美国学生、西班牙裔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已经成了校园里的常见状况，而不仅仅是偶然。我记得，在此期间，我曾经被访问斯坦福的客人问及，是否我们所有的少数民族学生都自愿选择住在分离的宿舍中。事实上，只有少部分学生选择住在具有种族“特色”的校舍中，一般来讲，这些人少于少数民族学生的 50%。我还经常被问到，是否“他们”曾经和非少数民族学生交流。当我告诉这些客人，种族之间的约会频率接近随机概率时，他们显得十分吃惊。电视和报纸宣传使他们以为，校园将爆发严重的种族骚乱。传媒对校园种族事件过火的报导，致使哈佛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建议，也许是管一管那些媒体记者的好时机！

学术上的行为不检被定期作为大学研究中的一个普遍问题而被公开。性骚扰的指控，特别是涉及到教师时，会出现在头版报纸上；如果它们被证实是无根据的，关于无罪的报道则会出现在报纸的第 17 页。传媒已经到处宣传校园里的“政治正确”。一项针对传媒新闻报导进行的分析指出，对这类题材的报道充斥于各种媒体，以往的事件也被反复地炒作，例如下面将会谈到有关斯坦福大学“西方文化”课程的修订。

即使是比较狭窄和技术的问题，也往往可以从新闻界那里得到非常出人意料反应。1994 年，在斯坦福的学术评议会上有一个关于条例的持续辩论。和其他一些大学一样，斯坦福大学已

经有一些年头了，允许那些不及格的学生重新选课，并且以第二个成绩作为成绩单上的成绩。一些人认为，这种惯例允许学生选择他们信心不足的课程，并且出于扩大知识面的考虑，而情愿冒险或不及格的风险。另一些人认为，它准许学生“游戏”评估过程。由于某种原因，这项政策已经成了分数膨胀的象征，即使事实上它对这种现象没有什么影响。最后，评议会决定废除这项规定，退回到较早的、让每一个成绩都显示在成绩单中的惯例中来。斯坦福的当事人认为，事情值得争论，但是还不至于惊天动地，然而，令他们惊讶的是，这次举动竟成了全国性的新闻。

《纽约时报》用一篇以尖刻和威吓为基调的社论评述这一事件。最后，读者被告知，对学生的溺爱得到制止，外界社会将有能力对相关的价值作出公正的判断。

《纽约时报》的立场反映了公众对高等教育不信任的一面。但是，这个系统内部的人基本上相信，他们的使命是要培养会思考、工作效率以及能理解、分析和反思他们文化与自然世界的毕业生，而外界的人则视高等教育为颁发证书的机构，即是一种以就业或其他为目的，对个体相对价值做出估计的机构。当然，有的时候这些目标并不冲突。但是，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些提供教育的人和赞助教育的人以及教育消费者会突然发现，他们的目标是不尽相同的。

价值的碰撞是与学生应该学习什么伟大作品和伟大思想的冲突相关联的，特别是和非西方作品是否应该算是传统“伟大作品”之列相关联的。已故的爱伦·布卢姆（Allan Bloom）著述了一本取名为《美国思想的禁锢》（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书籍，在 80 年代，这本著作强烈而保守地反对引入非西方著作。尽管这本书也许没有被广泛地阅读，但是由于受到布卢姆在芝加哥的同事索尔·贝洛（Saul Bellow）公开而热情的支持，它得到广泛的评论，销量很大。该书感叹缺乏一个以西方文化伟大作

品为基础的通识教育计划，因而在争论中得到知识界右翼势力的支持。这场争论很快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变得更为政治化。引起这种广泛传播的刺激性资料，是由斯坦福教师较早作出的另一项决定提供的。

这项决定是在 1987 年作出的，是关于一门新生必修课的几个变化的决定。这门课以前曾以不同形式出现过两次，这本身就暗示了高等教育的历史。它曾经被冠名为“西方文明”课，但基本上是关于欧洲历史和文化的课程。在 60 年代后期的大学校园骚动中它被摒弃，10 后恢复为“西方文化”的名称。但是，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独的课程，而是以几门课程为特色：一门是伟大作品课程，一门是历史课程，一门是以科学技术为重点的课程等等。所有课程内容必须来自于一个共同的阅读，从而相互配合，书单的结构十分像旧式的中国餐馆菜单。书单 A 包括了 15 本书；书单 B 则要长得多。负责一个方面课程的教师必须使用书单 A 上的所有书籍，可以从书单 B 的入选作品中选取一些。这种思路的部分成功之处在于，为整个班级的每个人提供一个共同而重要的核心阅读内容，并在宿舍的晚饭时间里激发来自不同内容课程的学生之间的谈话。（关于这种思想可以提到的最为善意的方面是，它是令人向往的；在食堂 10 分钟的吃饭时间里，即便是最出色和最聪明学生开展严谨讨论的欲望也受到了限制。）

在 1987 - 1988 学年提出并引起广泛争论的课程变化，实际上是相当温和的。它们包括起一个新的课程名称（“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增加一条新的课程线索，侧重在种族与性别问题的新方法，以及书单 A 上的阅读书目从 15 本减少到 8 本。从书单 A 上被删去的阅读书目可以在书单 B 中找到，这种变化是为了回应教学人员提出的关于 15 本阅读书适用于各种的课程，简直是给他们的课程安排设置了太多的限制。

这本来是学术机构里十分平常的情形，因为事情本应该如

此。两个教师委员会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向评议会提出了建议。在 5 个冗长的会议中，全体评议会成员针对提议进行了辩论，并按此作了些妥协。最后的解决方案在广泛赞同中通过，并得到参与该计划的教学人员的热情支持。

但是，令许多斯坦福人惊讶的是，这场辩论在教师采取最后行动之前，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媒体风暴。当然，《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言语尖刻的社论。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参与了争论，他指责斯坦福屈服于高压统治，即屈服于少数民族学生，他们抗议旧的课程方案示威支持变革。据学术导闻文献记载，在这个决定性的关键时刻，牧师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带着一群示威者呼喊，“嘿，嘿，嗨，嗨……西方文化必须滚开。”

《新闻周刊》以“再见，苏格拉底”为大字标题报导有关西方文化辩论的新闻。美国几乎每一座城市的报纸都对此事作了评论，在报纸的教育版（op-ed），乔治·威尔（George Will），查尔斯·克劳特哈默（Charles Krauthammer）等人反对这种变化。与此同时，埃伦·古德曼（Ellen Goodman），埃米·施瓦茨（Amy Schwartz）等人则支持变革。

作为校长，我发现，校园辩论是针对“学术变化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的问题进行辩论，是有启发性的，并最终被采纳。的确，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更重要的了：什么是受教育的人应该共同掌握的智性财富？与此相对照，公众的讨论似乎太肤浅，而且经常给人以误导。

由于知识与价值之间的深刻关系，课程的变化成了一个外界密切关注的对象。那些对新课程给予了极大关注的新保守主义者，极其有力地表达了对新课程的许多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与担心西方信念和价值被剪除有关，而不仅仅是一份阅读书单的问题。由许多批评家采用的“文化相对论”一语，反映了这种担

心，即如果我们对那些有助于形成美国当代文化的非西方要素给予过多的重视，那么就是在暗示由它们所代表的价值拥有同等的地位。也许，这种观点的最极端形式来自于普林斯顿的退休教授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他在《华尔街日报》中写到，“如果西方文化真的消失了，许多其它事物也会随之消失，其它文化则会取而代之。”在“其它事物”中，他列举了奴隶制、后宫制，以及政治自由的丧失。

在学习知识方面，人们需要得到指导。在 20 世纪初期，一些主要的学术中心，包括哈佛和芝加哥大学，它们为公众出版的伟大作品，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对经过了包装的知识的同样热诚，一代走门串户的推销员应运而生，他们很快说服热心的父母竭尽全力使他们的孩子能有最新的百科全书。现在，想要知道“一个人需要知道什么”的愿望甚至变得更为强烈。我们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知道“重要的知识是有疆界的”可以真正地使人恢复信心。因此，当一种标准的基础似乎要被放弃的时候，某种确实的不安全感就会出现。以前我们就看到过这种现象，即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自然与哲学的统一在突然之间变得过时。正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指出的那样，来自学术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的反应，比来自宗教界的反应更为尖锐。同样的道理，对于知识边界的需要在今天甚至更为强烈。全国人文科学捐助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NEH）的负责人曾经发表了一份有关必备知识的清单，并且很快被采用了。但是，当一所著名大学在新生必修课向新知识开放时，它却制造了新闻，一条使人混乱的新闻。

确实，变化本身经常是公众不满的根源。人们通常担忧的不是课程或教育计划的变化。他们对于大学的作用、或者是大学的管理方式、再就是大学与其它社会组织关系的关心，发生了根本变化。

从 70 年代开始，公众对所有这些关系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大学形象是象牙塔——一个没有集市生活那种喧嚣的地方，一个伟大思想、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思想可以在没有干涉的条件下得到发展和辩论的地方。为了实现这种隔绝所付出的部分代价是，大学与商业界相分离；前者被看做是高尚的、苦修的、几乎像神学院似的，并且远离于利益与荣耀。即使是在战后过渡到高速发展的科技时代，这种形象也一直被保留下来，即只要从业者在本行业内为他们的工作和声誉提供支持以外不再寻求别的什么，他们就继续有这种保障。

但是，后来发生了几件事情。当政府的资源变得越来越有限的时候，高等教育机构也更为积极主动地争取提高教育经费在国内支出中的份额。在寻求更多的研究基金和更多的学生资助过程中，美国的大学成为更为谄熟的游说者，同时也失去了一些特别的光彩。当 1986 年税收法案修订在国会进行辩论的时候，私立机构特别为几项条款而战，其中包括对捐赠重要财产的特别优惠税收待遇和为了支持建设新设施而签发免税债券的权利。这些并非完全不合理的要求，确实，这两项条款成为国家税收政策的一部分已经有些时候了。令人惊奇的不是大学失去了这两项优惠，而是当它们被自己校友的年轻议员告之，它们被看做“只不过是和大型石油公司（Big Oil）一样的另一个利益集团”。

也许另一种现象可以强化，即大学对资金有越来越多的需求。高等教育预算的增长是一个无情的事实。经济学家霍华德·鲍恩（Howard Bowen）曾经这样描述学术财政的简单公式：“尽可能多地资金，并且全部花掉你所筹集到的资金。”这其中有很多道理。大学追求的是卓越超群；当有更多资源的时候，它们就可以被用于雇佣更好的教师和建造更好的设施。而当有节余的时候，它们更有可能被用于计划的改进，而不是当未来收入减少时才使用。

这不只是缺乏财政纪律或者不遵守惯例。知识经济学中有一条难以调和的规律，据我所知，最初是由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提出来的：费用超过先前同等单位知识的新知识单位或本是递增的费用。这并不难解释。我们倾向于先回答较容易些的问题；对它们的回答会提出较困难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调查中发展出新的工具，可以把它们应用到后续的工作中去。由于边际效益的不断增值，我们发现自己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所以，正是由于它的这种性质，学术是在自身基础之上发展的。从 20 世纪科学文献量的增长率上可以证明人们对发展的欲望，这种增长率平均每年在 6% 到 7% 之间。不仅在研究上，而且在教学上，这暗示了大学功能的巨大成本。

我发现，这类解释对校友或者对父母从来没有产生过很好的影响，他们一直在为子女挣学费，这几乎是 25 年前他们所缴学费的 10 倍。毫无疑问，我们大学学费的增长已经有点超前于扣完所得税后的收入增长。核心的问题是，纳税后收入的增长已经停滞，学生家庭感到拮据。当他们的收入下降时，房价却在飞涨，而学费支出则常常是他们所开出的最大单项支票。因此，他们感到愤怒是不足为奇的。对大学仇视的还有另外一些人——那些视增长着的国家教育税收或者来自他们母校或邻校连续的集资恳求为贪婪的人。

与此同时，大学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在增长。在公众的印象中，衣衫褴褛的文雅风度与心不在焉同是大学教授的特征。这就是大学教师是怎样因为他们的聪明才智而被原谅的全部情形。如果教授（或他们的机构）突然变得富裕和精明起来，象牙塔和普通公众之间融洽的社会契约就会破裂。这是学术界和商业界最近的联合趋向产生的一种影响。在公众对高等教育所持这种态度背景之下，问题比利益的冲突或其它微妙的事情简单得多。它主要就是太多钱的问题。当分子生物学教授因为

校外商业投资而变的富有时，公众对他们及其所在机构的态度就会改变。当大学和医药公司进行数百万元的交易来支持研究，而且这个公司随后获得相应的知识产权时，难题便随之而来。对于一些人来说，大学可以给他们自己的教员以发明的特许专利，并且从中收取回报，这些看起来是不适当的。一般认为合情理的情况是，大学教师被付足够的工资，拥有他们喜欢的自由，所以大学不应该从他们的研究中获利。这不是真正深思熟虑或公平的观点。毕竟，其它的行业能够赚取额外收入而没有受到批评，而且，如果大学不从他们的知识产出上得到一些回报，更多的压力将会加在学费上。尽管如此，这种观点已经根深蒂固：学术和营利水火不容。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公众的不满情绪渐渐膨胀。跟随阿伦·布卢姆作品而来的是那些愤愤不平的大学教师和外界批评者海潮般反省的文献。有几个标题足以说明问题：“狭隘的教育”，“精神的扼杀”；学术阴谋(Profscam)，“神殿里的骗子”。受到这些小题大做的报导影响，政府部门和委员会宣布，公众对大学的信心已经降到了新的最低点。在即将结束漫长而卓有成绩的校长任期之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在1989年给校董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这个国家的评论界在过去10年中对大学的攻击超过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候。”

当然，大学不再被厚爱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政治上的伤害。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政府似乎是第一次认真地努力控制大学里的研究和限制大学里研究者的权利。这10年也经历了联邦政府发动的其它有关限制传统大学特权或冲击大学机构的运作的情形。例如，拟控制毒品的新法律要求大学保证积极执行有关毒品和酒品使用的法规。每个人都在于同意，滥用毒品和酒品是一件坏事情，但是联邦政府干涉的意图，要把大学的作用与警察的作用结合起来。

因为怀疑一些学校在暗中交流有关学费、教师工资和学生财政资助等信息，从而违反了反托拉斯法，1991年司法部发起了一项针对56所大学的民事调查。回应这种指控所要起草的材料不计其数，投入在提供证据和准备报告上的时间也同样数量可观。虽然事情最终是根据基本上对大学有利的条件决定的，但是这些大学肯定不会补回他们在回应中所花费的大笔开销，其总数肯定超过2000万元。

人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是否公众对大学的反对会导致它们容易受到这类攻击的伤害。但是，在最近的一个例子中，干涉是太过于政治化了，由于大学缺乏有效抵制干涉所需要的民众支持，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形。1995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威尔逊（Wilson）在总统竞选的早期阶段宣布，他支持取消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并以此作为任命州政府官员的一项标准。之后，他开始公开地努力说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董事们投票取消在录取学生与聘用员工的程序中的平权行动。对于大学的董事们来说，认真听取教师、9个分校校长和大学校长的建议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所有这些方面都支持大学保留独立制定招生政策的权力，大学董事会通常把这种权力完全下放给大学。然而，威尔逊州长的努力最终还是获得成功，因为几乎所有的大学董事都是由威尔逊或他的共和党前任州长任命的，平权行动最终被废除。这是近期发生的政治严重干预高等教育的一起事件。如果大学真是抵御政治干预的坚实堡垒，那么，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尽管有这些不利的宣传和政治干预，很可能是正如马克·吐温谈到瓦格纳音乐时说过的那样，公众对大学的看法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糟糕。尽管证据不够全面，但还是有证据表明，相对而言，为我们这些学术界人士所害怕的对大学的抨击并没有形成气候。而且，我们所目睹的公众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可能只是一种大的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